

全 面 解 读 一 生 不 容 错 过 的 古 典 名 著

· 名家解读古典名著 ·

话本与文言

小说 上

侯忠义

主编

解读

《三言》
《两拍》
《无声戏》
『剪灯三话』



辽宁教育出版社

全面解读一生不舍错过的

013034569

I207.41

68

V4-1

名家解读古典名著·

话本小说

上

小说

侯忠义
主编

解读



《三言》
《两拍》
《无声戏》
《剪灯三话》



北航

C1642186

辽宁教育出版社

013034289

©侯忠义 20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家解读古典名著. 话本与文言小说. 上 / 侯忠义主编.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382-9968-7

I. ①名… II. ①侯… III. ①话本小说—小说研究—中国—古代 ②文言小说—小说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8514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字数: 245 千字 印张: 14.5
印数: 1—5000 册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严中联

责任校对: 马 慧

封面设计: 谭慧丽 张 瑞

版式设计: 王 萌

ISBN 978-7-5382-9968-7

定价: 25.00 元

目 录

解读“剪灯三话”	1
一 “剪灯三话”与作者诸谜	2
二 “剪灯三话”的产生与天时地利	9
三 “剪灯三话”的道德观与因果论	16
四 “剪灯三话”的婚姻观与悲剧美	22
五 “剪灯三话”的鬼神观与佛道影响	28
六 “剪灯三话”的人物与精神分析	38
七 “剪灯三话”的诗词与文人处境	43
八 “剪灯三话”的借鉴与遗泽	51
解读《三言》	55
一 杰出的通俗文学家	56
二 短篇白话小说的宝库	62
三 《三言》作品分析	70
四 涵盖《三言》全书的两大特点	98
五 《三言》的流传和影响	102
六 冯梦龙的其他作品	108

解读《两拍》	117
一 话说凌濛初	118
二 历史变动时期的一面镜子	131
三 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璀璨明珠	157
四 《两拍》功过评	174
解读《无声戏》	187
一 一代悲剧的天才	188
二 “生无他癖，惟好著书”——李渔的文艺观	198
三 短篇小说集《无声戏》	205
四 “当世耳目 为我一新”——李渔小说的成就	214

名家解读古典名著 话本与文言小说(上)

解读“剪灯三话”

薛克翘 著

“剪灯三话”是《剪灯新话》《剪灯余话》《觅灯因话》三部小说集的合称，其中《剪灯新话》是一部开明代小说先河的作品集。本书从中国小说史、文学艺术、历史宗教等角度，对“剪灯三话”的历史地位、艺术成就、思想倾向等作了全方位的解读。

一 “剪灯三话”与作者诸谜

有明一代，中国小说得到空前发展。元末明初出现了中国最早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中叶又出现了《西游记》《金瓶梅》等长篇名著；短篇小说集《三言》《两拍》亦在明代编成，并享有盛名，足以流传千古。这些，都是明代小说发达的标志。但是，人们过分注意这些白话小说，而往往不大重视明代的文言小说。这是因为明代的白话小说确实是成就卓著，是中国小说长河中的巍然浪峰，而文言小说则相形见绌，其光芒亦掩而不彰，致使文学史家在论及明代小说时，对白话小说津津乐道，不惜笔墨，而对文言小说一笔带过，惜墨如金。

随着历史的发展，文明的进步，白话小说取代言言小说是一种必然。从白话小说产生、发展，直到它最终取得一统天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国社会跨进现代文明的门槛时，这一过程才告结束。我们应当注意，在中国小说发展的这一漫长历程中，文言小说是贯穿首尾的，并且一直对白话小说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即使在明代，文言小说已明显呈衰败景象时，它对白话小说仍然有巨大影响。我们知道，中国小说在唐代形成了以唐传奇为代表的高峰，可以说，这时中国小说发展几乎到了极致阶段。物极必反，就在这一高峰崛起的同时，俗文学已经为白话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唐传奇之后，清代出现了以蒲松龄《聊斋志异》为代表的另一高峰，然而它却同时宣布了文言小说的衰亡。但不管怎么说，唐传奇和《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小说的两个高峰，这是文学史家的公论。

任何一个高峰的形成都不是偶然的。它必然是一种能的凝聚，力的结集，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使然。《聊斋》的出现也非偶然，其中有天时，有地利，也有人和，诸多因素的汇合，遂使异峰突起，蔚为壮观。这中间，明代文言小说的积蓄之功，其过渡性的桥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一) 何谓“剪灯三话”

明代言言小说，就其数量而言，也足以汗牛充栋，而其间的佼佼者，要算是“剪灯三话”（以下简称“三话”）。“三话”是三种小说集的合称，其第一部，也是最突出的一部叫《剪灯新话》（以下简称《新话》），其次是《剪灯余话》（以下简称《余话》）和《觅灯因话》（以下简称《因话》）。

“剪灯”二字中的灯，是指烛灯而不是油灯。古时人们用以照明的灯主要是烛灯和油灯两种。人们有这样的常识，每当油灯暗下来时，把灯芯拨高一些，灯光会变亮。每当烛灯暗下来时，把烛芯顶端的“开花”剪掉，烛光就会变亮。由此可知，在夜晚，一面说话一面还要不时地剪灯，其所谈论的内容一定是很吸引人的。作者将自己的小说集命名为《剪灯新话》，用意正在于此。而《剪灯余话》中的“余”字，是“剩余”的意思，引申为“继续”，意思是《剪灯新话》的续作。至于《觅灯因话》中的“因”字，则是“由……而引起”的意思。《因话》作者自己对他的书名作过解释，他说，他书房的桌子上有一本《剪灯新话》，客人来访，非常喜欢这部书，一直读到半夜。这时，客人又为他讲了一些故事，这些故事深深打动了。这时，灯已经灭了，他叫人重新找来灯点上，把客人的故事有选择地记录下来。因灯灭而重新找灯点，又因《剪灯新话》而引起这事，所以命名为《觅灯因话》。

“三话”中以《新话》出现最早，也最有成就，分为五卷，收作品凡二十一篇。《余话》仿照《新话》，亦分为五卷，作品二十二篇。《因话》仅二卷，作品八篇。这三部书问世以后，历尽沧桑，尤其是前两种，曾因被禁而散佚颇多，后因得到日本流传的足本，才使我们今日得睹原貌。现在的版本，以周夷（楞伽）先生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新版为最佳。书名为《剪灯新话》，而另两种编在其后。这样“三话”合一，很便于阅读。下面凡引“三话”原文，皆依此本。

（二）灯与话的回顾

在现代汉语中，“话”的意思是口头表示的声音，是“话语”的意思。但现在要讨论的“话”不同，是指故事或小说。“小说”一词出现较早，最早见于《庄子·物外篇》，但最初并不是指一种文学体裁，而是指小的、不重要的话语和事理。“故事”一词最初也不是一种文学体裁，而是指“过去的事情”。后来，大约汉晋时代的《汉武故事》一书问世后，“故事”一词才开始有成为一种文学体裁的迹象。至于“话”，成为一种文学体裁则是较晚的事。唐代出现了“说话”，这个“话”就是故事。这些变化，从古代小说集的命名上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隋以前的小说集通常不使用“话”字，而是使用意义相近的“说”和“语”字。例如《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伊尹说》《鬻子说》（均失传），南朝刘义庆有《世说新语》，殷芸有《小说》十卷等。隋以前的小说还常以“记”“录”“传”“志”等字命名，如《玄中记》

话本与文言小说(上)

《搜神记》《幽明录》《近异录》《灵鬼志》《冤魂志》《东方朔传》《列异传》等。这些恰好证明了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所作的“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论断的正确。他还认为，中国人开始有意识地做小说是在唐代。也正好是在唐代，“话”字开始被用于小说集名称。题为唐人刘餗撰的《隋唐嘉话》一书，首次使用了“话”字。不久，又有了赵璘的《因话录》、韦绚的《刘公嘉话录》。同时，“谈”字也开始使用于小说集总名，如韦绚的《戎幕闲谈》《佐谈》等。

由此可知，“三话”中的“话”字是从唐代因袭下来的，是唐人开始有意做小说的结果，而其前身，“说”和“语”字作为小说的意义，则可以追溯得更远。

我们还注意到，“剪灯三话”中又都有一个“灯”字。为了说明灯与话的关系，同样需要从古代小说集的命名上寻找些线索。唐代小说集没有以“灯”字命名的，宋代才出现了一部无名氏的《灯下闲谈》，灯和谈同时并举，“谈”就是“话”。其后，一个叫惠洪的和尚撰了《冷斋夜话》，夜与灯似乎关系密切。可知，将“灯”与“话”同时用于书名的，《剪灯新话》并非首次。然而，在《新话》之后，却有一大批继作，形成了洋洋可观的灯话系列小说。例如，明代有周礼的《秉灯清谈》和《剪灯余话》（与前述《余话》同名）、丘燧的《剪灯奇录》、周八龙的《挑灯集》、陈钟盛的《剪灯纪训》、无名氏的《剪灯续录》；清代又有戴延年的《秋灯丛话》、王楫的《秋灯丛话》、蒋坦的《秋灯琐记》、宣鼎的《夜雨秋灯录》，等等。

到这里，人们也许会问：把灯和话拉到一起来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仅从书名来看，至少能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1. “三话”的出现，是受了唐宋传奇影响，是唐宋传奇在明代的继续；

2. “三话”是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一环，应认真加以分析和评介，而不应当受到忽视和冷落；

3. 灯和话的关系还告诉我们，这类故事都是夜间讲的，夜晚是人们整日劳作后需要休息和消遣的时刻，当时又没有影视节目和酒吧、夜总会之类去处，听故事便是一种好的享受，而在夜晚讲些灵怪粉脂类故事，更容易创造出一种扑朔迷离、不阴不阳的氛围，使听者进入一种幽深玄秘的境界，从而激发情趣，展开联想。

(三) “三话”作者诸谜

“三话”成书以后，曾遭禁止，再加上一些记载不详，所以给后人留下了一些不解之谜。

1. 《新话》的作者是谁？

从现在已掌握的资料看，《新话》所收二十一篇作品似乎并不都出于一人的手笔。多数史料上都说《新话》的作者是瞿佑（字宗吉），但明代即有人提出疑问。都穆在他的《都公谈纂》中说：

予尝闻嘉兴周先生鼎云：“《新话》非宗吉著。元末有富某者，宋相郑公之后，家杭州吴山上。杨廉夫在杭，尝至其家。富生以事他出，值大雪，廉夫留旬日，戏为作此，将以贻主人也。宗吉少时，为富氏养婿。尝侍廉夫，得其稿，后遂掩为已有。唯《秋香亭记》一篇，乃其自笔。”今观《新话》之文，不类廉夫。周先生之言，岂别有本耶？

这条材料只是记下了周鼎的话，连都穆本人都表示怀疑。周鼎认为《新话》的作者是杨廉夫，而都穆却认为《新话》的文笔不像是杨廉夫的。事实上，杨廉夫在杭州逗留仅旬日，似乎也不大可能一口气写出二十篇作品。

时隔不久，明人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中又提到“卢景晖之《剪灯新话》”，似乎《新话》的作者是卢景晖。

今人戴不凡先生在他的《小说见闻录》中又提出一条材料，说他有一明刊小说残本，书根有“剪灯”二字，残留的第一至第七篇均见于《新话》和《余话》，且各自标明作者如下：

芙蓉屏记：庐陵李桢

秋千会记：庐陵李桢

联芳楼记：阙名

聚景园记：山阳瞿佑

牡丹灯记：元 陈情

金凤钗记：元 柳贯

绿衣人传：元 吾衍

由此，戴先生认为：“《剪灯》并非一人之作，实系编辑成书者也。”

与戴先生材料相印证的是谭正璧先生《古本稀见小说汇考》中所载：董康《书舶庸谈》卷八下，说有日本藏明刻《剪灯新话》十二卷，其卷三前七

篇题目、作者皆与戴先生藏本同。

相反,认为《新话》是瞿佑作的也大有人在。明代郎瑛的《七修类稿》、高儒的《百川书志》、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以及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等,都说《新话》是瞿佑所作。尤其是为《新话》写序的几个人,如凌云翰、吴植、桂衡及《余话》作者李桢,为《余话》写序的曾荣、张光启等,均与瞿佑大体为同时代人,且都属名士,皆以《新话》为瞿氏手笔而不疑。

那么《新话》到底是不是瞿佑的作品呢?我们觉得,说《新话》是杨廉夫所作,而瞿佑只是将杨作“掩为己有”,言近于诬,且证据不足;说《新话》是卢景暉所编,则仅有欣欣子的只言片语,亦不足为凭。如果说《新话》是瞿佑编辑加工,中间掺杂着他个人的作品,似乎比较可靠。因为瞿佑自己在《新话·序》中明确声称,“余既编辑古今怪奇之事,以为《剪灯录》……”可见他并没有贪天之功据为己有的意思。

2. 瞿佑小传

明清两朝,关于瞿佑生平的文字材料不算少,但其中仍有一些谜。明人的资料有郎瑛的《七修类稿》、万历年间的《杭州府志》,清代的资料有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朱彝尊的《静志居诗话》、徐钊的《词苑丛谈》及《浙江府志》《钱塘县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这些书中对瞿佑均有提及,但都很简略,且有不少属因袭前人成说。归结上述资料,介绍瞿佑生平如下:

瞿佑,字宗吉,钱塘(今杭州)人,元末至正元年(1341年)生,明宣德二年(1427年)卒,终年八十七岁。他自幼聪慧,受过良好教育。十四岁时,当时的一些名士让他即席作诗,他便吟出《鸡》绝句一首:“宋宗窗下对谈高,五德名声五彩毛,自是范张情义重,割烹何必用牛刀。”四句各出一个关于鸡的典故,备受称赞。洪武中(约1382年前后),瞿佑由贡士被推荐为仁和县训导,后又任临安教谕;洪武末(约1389年)任河南宜阳训导,不久又升任周王(朱橚)府右长史。永乐中(约1415年),他因诗蒙祸,被流放到保安十年。洪熙元年(1425年),因英国公张辅奏请,皇帝赦免瞿佑。于是他回到北京,在英国公府上主持家塾三年,尔后被放回杭州,不久即死去。

瞿佑一生坎坷,虽满腹文章,多有著述,但始终不得志。他当过训导、教谕之类不入流的小官,实际上是教书匠;他所得的最高官位是王府右长史,

充其量不过是个正五品的官。他因诗蒙祸的具体情况亦不可知，十年的流放生活也记载很少。据《列朝诗集小传》记载，瞿佑谪戍保安时，“当兴河失守，边境萧条，永乐己亥（1419年），降佛曲于塞下，选子弟唱之，时值元宵，作《望江南》五首，闻者凄然泪下。又有《漫兴诗》及《书生叹》诸篇，至今贫士失职者皆讽咏焉。”据记载，瞿佑一生著述颇丰，达一二十种之多，其中有诗作，有小说，也有研究专著。但可惜的是多已散佚，今存的除《新话》之外，还有《香台集》《归田诗话》《天机云锦》《咏物诗》《四时宜忌》等几种。

瞿氏生平中有这样几个小问题需要辨明：

（1）瞿佑到底是钱塘人还是山阳人？

许多材料上都说瞿佑是钱塘人，这当是没有问题的。但瞿佑本人却自称“山阳瞿佑”，桂衡在《新话·序》中称他为“山阳才人”，戴不凡藏本《剪灯》中也称他为“山阳瞿佑”，这似乎又证明瞿佑确实是山阳人。

瞿佑为钱塘人，这有许多证据。凌云翰在《新话》的序中称瞿佑为“乡友”，而他自己的署名也是“钱塘凌云翰”。瞿佑的家在杭州，他的《新话》自序就写于杭州吴山大隐堂。他十四岁在杭州，这是确定的，而当时其父、其叔祖都在杭州。其家当时曾建传桂堂，与许多名流交接，说明瞿氏是杭州有名望的家族，而这不是经营三年五载就可以达到的。瞿佑在谪戍保安时写过《望江南》五首，这显然是模仿白居易《望江南》而写，白诗有“忆江南，最忆是杭州”句，这又可以作为瞿佑怀念故里杭州的旁证。

明代山阳有二：一在今陕西商县南，一在今江苏淮安，瞿氏的山阳为后者的可能性大。古人有个习惯，署名时喜欢把自己的籍贯署在名前。古人称籍贯为“郡望”，是祖上的出生地和居住地。瞿佑正是这样，自署山阳，是把籍贯列于名前，表示自己不忘祖先故地，这是旧时宗族观念的反映。由此可知，钱塘是瞿佑的故里，而山阳则是其祖上的故里。所以，我们应当肯定，瞿佑是钱塘人。

（2）瞿佑流放的保安在今何处？

明代的保安有二：一是今陕北保安县，二是今北京西北河北境内的新保安一带。瞿佑是永乐中被流放到保安的，当时元朝覆灭不久，北方边陲不安宁，朱元璋时曾在北京四周设立四卫，以保北京安全，其中之一称“保安卫”。《列朝诗集小传》中有“兴河失守，边境萧条”字样，其“兴河”当为“兴和”之误。兴和地处今内蒙古靠近河北宣化的地方，又确于永乐年间失

守，而宣化、保安一带成为边境，这是符合史实的。今查陕北保安范围并无一个叫兴河或兴和的地方，因此，瞿佑所戍之保安应在今河北新保安一带。

(3) 瞿佑说“余既编辑古今怪奇之事，以为《剪灯录》，凡四十卷矣”。其中，《剪灯录》当为《剪灯新话》之别称，而非另有《剪灯录》一书。“四十卷”当为“四卷”之误。

3. 李祯小传

李祯，字昌祺，明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其父李伯葵有诗名，号盘谷钓叟。可见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李昌祺生于洪武九年（1376年），卒于景泰二年（1451年），终年七十七岁。永乐二年（1404年）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参与撰修《永乐大典》，当时，同事们都认为他学问渊博，每有疑难便找他请教，往往都能得到正确答案。后来，他被提升为礼部主客郎中，因才能和名望突出又被派往广西任左布政使。在广西因事犯法，被贬官服役，不久遇赦。但事隔七年，他又被流放到房山（今北京房山县）服役。遇赦后，于洪熙元年（1425年）被官复原职，派往河南任左布政使。在河南，他与右布政使萧省身一起，法办当地豪猾，革除贪残，疏滞举废，救灾恤贫，在数月之间使政化大行，深受百姓拥戴。但不久，因父母丧事归故里居丧。当时按古礼守丧，一般三年，其间不出外经商或为官。但因朝廷大臣们以他为政廉洁，待民宽厚，河南百姓非常怀念为理由，请求朝廷尽早起用他，所以明宣宗又特地命他停止守丧赴河南上任。正统四年（1439年），他因病坚决请求辞官归乡，当时他还不到告老还乡的年纪。回乡后，家居二十年，从不在官场抛头露面，他家的房子简陋得仅可遮蔽风雨，生活并不富裕。

李昌祺所获最高官位为左布政使，为从二品官阶，相当于一省之长，时人称之为“方伯”。他自幼有才情，弱冠之年便文誉蔚起。其著作除了《剪灯余话》外，还有《运甓漫稿》《客膝轩草》《侨庵诗余》等。他虽然做过高官，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两涉忧患，饱食之日少”（《余话》自序），可见其一生并不顺利。然而，戏剧性的事情发生在他死去之后。当时，韩雍巡抚江西，要在学宫祭祀先贤，而当地的故老以李昌祺写过《剪灯余话》为由，坚决反对把他列为先贤。

根据李昌祺的有关史料，其生平中也有几个小问题：

(1) 《明史》本传和《听雨纪闻》中都说李氏为永乐二年（1404年）进士，而《列朝诗集小传》中说他为永乐癸未年（1403年）进士，孰是孰非？

《余话》王英序中曾提到他与李为同年进士，查《明史》卷一百五十二《王英传》，记王英为永乐二年进士；又《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中亦记王英、曾荣等为永乐二年进士。由此可证，《列朝诗集小传》有误。

(2)《列朝诗集小传》乙集《李布政祜》条还写道：“父丧服除，改河南。丁内艰归。宣宗命夺丧乘传赴官，风疾增剧，不待引年，坚乞致仕。”而《明史》本传记曰：“……命夺丧赴官，抚恤甚至。正统改元，上书言三事，皆报可。四年，致仕。”前者说李昌祺不到引退之年而坚决辞职的原因是“风疾增剧”，这与《明史》所记有出入。据《明史》，李昌祺从赴官到致仕，中间至少隔了四年，这期间，没提他病情增剧的事，反而说他屏迹乡里后“家居二十余年”，看来他致仕后身体相当不错。如果不是因病重退休，那么他为什么会过早引退呢？这恐怕与他的人生哲学有关。明人叶盛在其《水东日记》卷十四中说李昌祺“为人耿介廉洁，自始至归老，始终一致，人颇以不得柄用惜之。尝自赞其像曰：‘貌虽丑而心严，身虽进而意止；忠效禀乎父师，学问存乎操履；仁庙称为好人，周藩许其得体；不劳朋友赞同，自有帝王恩旨。’盖亦有为之言也。”这里，“身虽进而意止”就是李昌祺人生哲学的概括。他大约从数十年的仕宦生涯中看到了些什么，适可而止，毅然引退。

4.《因话》作者邵景詹

有关邵景詹生平的资料极少，今只有书前《小引》一篇，其开首写道：“万历壬辰，自好子读书遥青阁。”从这句话可知，邵景詹生活于明万历年间，《因话》作于公元1592年，他自号为“自好子”，遥青阁是他的书斋。但邵氏为何许人，生平如何，有何亲朋好友，是否有其他著作，一概不得而知。据《因话》所写的故事发生地来看，邵景詹有可能是江浙一带人。但在没有发现新材料的情况下，这一切都只是些谜。

二 “剪灯三话”的产生与天时地利

凡文学作品，都是应运而生。也就是说，文学作品都是时代的产儿，它们属于自己所产生的时代，也反映时代的风貌与特征。因此，离开了时代氛围而单纯地探讨作品的思想意义、艺术特征和美学价值，是得不出正确公允的结论的。

那么，“三话”产生于什么样的时代呢？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元末明

初社会的状况，即通常所说的时代背景。

(一) 元末明初的社会大动荡

十三世纪后期，我国北方的蒙古人秉承成吉思汗的余威，相继灭掉了盘踞于中原的金朝和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建立起南北统一的元帝国。元朝统治者将国人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这一划分是为便于统治，是一种民族歧视，但归根结底是一种阶级压迫。因此，在元帝国统治的近百年时间里，各地反对元朝统治者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终于，元朝末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各地义军纷纷揭竿而起：先是白莲教领袖刘福通在颍州（今安徽阜阳）起义，并很快攻占了河南南部，继而是徐寿辉在蕲水（今湖北浠水）起义，郭子兴在濠州（今安徽凤阳）起义。他们都称为红巾军。此外，张士诚也在江苏起兵。其中，刘福通的队伍发展壮大很快，分四路在北方作战，沉重地打击了元朝的统治。同时，徐寿辉的红巾军攻占了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队伍也很快发展到了百万人。

朱元璋于1352年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郭死后，朱元璋取代，并趁机大力发展自己的势力。后来，刘福通因遭降元的张士诚军围攻，英勇战死；徐寿辉则被部下陈友谅杀死取代。此时，朱、张、陈等实际上已成为各据一方的军阀，互相攻伐混战，只为争当皇帝。朱元璋经过十多年战斗，先后灭掉了陈友谅和张士诚的势力，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一跃而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他残酷地镇压了其他义军的残部，并于1367年发布讨元文告，向北进取中原。1368年，他在应天（今南京）称帝，建立了明朝，改年号为洪武。同年，明朝大军攻占了大都（今北京），元朝覆灭。此后，朱元璋在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里，连续用兵，先后攻占了西北、西南和东北的广大地区，完成了统一大业。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除了东征西伐，统一中华以外，在经济上，他还鼓励农耕，减免赋税，发展了农业生产；在政治上，他集天下权力于一身，改革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对一批开国功臣实行大规模杀戮，使冤狱遍于国中；在文化上，他一方面建立了一整套科举和学校制度，加强封建教育，培养封建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又大兴文字狱，使文人动辄得咎，用以限制知识分子의思想和言论。明成祖朱棣夺得皇帝宝座以后，也与朱元璋一样，严刑屠戮，利用恐怖手段以巩固其封建专制的集权统治。朱氏父子的所作所为一方面发展了经济，促成了社会的安定，另一方面又对思想文化严加控制，造成了一种沉闷的思想政治空气。

元末明初的社会大动荡，是产生优秀文学作品的土壤。血与火中饱含着无数的流离失所和弱肉强食，无数的悲欢离合和喜怒哀乐。这仿佛是一座巨大的宝藏，只要愿意，便可以从其中拾取大量活生生的材料，稍加文饰，便可以成为感人的佳作。《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最后定型，便与这土壤有关。

《三国演义》的故事虽以东汉末年农民起义和魏蜀吴三国互相攻杀吞并为事实依据，但这和元末明初的社会动荡有许多相似之处：张角的起义与红巾起义相似；魏、蜀、吴的斗争又与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间的相互兼并相似。《水浒传》以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为背景展开故事情节，这也与元末农民起义有一些相似之处。我们在数百年后读这些作品尚深受感染，试想，它们在元末明初的广大民众中该会引起多么大的共鸣！因此，可以说《三国》《水浒》能在元末明初最后定型，形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种规模，是历史促成的，是元末明初的社会现实促成的。

除长篇小说外，短篇小说在这一时期有所发展变化也是情理中的事。就文言小说而言，在唐传奇后，经过了一个长时期的衰落，此时又得以重振和复兴，出现了“三话”这样的作品，不能不说它们的产生也基于这样的土壤。在那样的时代里，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文人多心灰意冷，拾掇素材，闭门造书便成了他们的精神寄托，人生乐趣。于是乎，前朝人物传奇、烟粉故事、阴曹地府及妖魔鬼怪的故事便一涌而出，而这些故事又深受读者欢迎。因此可以说，“三话”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得利于天时。

（二）“三话”与地利

“三话”是时代的产物，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这是不容怀疑的。只有把握住这一点，我们在阅读它们的时候，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它们，既不苛求于前人，也不讳言其糟粕。同样，“三话”又是与地区、人事有密切关系的，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任何文学作品都产生于特定的国度，特定的地区，特定的民族，出于某些特殊人物之手，这样，作品本身就带有地方特色，也反映作者的风格和特征。这里所说的地利，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三话”中的故事发生地大多在南方，即长江中下游地区或者更南面。“三话”的作者瞿佑为浙江杭州人，李昌祺为江西吉安人，虽不知邵景詹之乡籍，但他也多半属江浙一带人氏。那么，为什么“三话”的作者都是那一带人而不是北方人呢？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三话”之得地利，以《新话》最为突出。瞿佑为杭州人，而杭州以其地理上的特殊条件，气候宜人、风光秀丽、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等，抚育了许多名人，瞿佑应算其中之一。又有许多名人到过杭州，使本已得天独厚的杭州锦上添花，声名远播。这里不妨作个简单回顾：传说大禹治水成功后，要到会稽（今绍兴）山去大会诸侯，路过杭州时在那里“舍杭登陆”，杭州由此得名。春秋时吴越争霸，杭州当时虽然还是沙滩，但已属吴越之地。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吴越旧地设会稽郡，在灵隐山下设钱唐县，这就是杭州的前身。西汉武帝时，钱唐曾一度为会稽郡的治所。南北朝时，杭州以钱塘江入海口而成为东南重镇。隋炀帝时开凿的大运河，北起涿郡（今北京），南至杭州。唐代李泌曾任杭州刺史，兴修水利，促进了杭州的繁荣。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亦曾任杭州刺史，在那里做了几件有口皆碑的好事，并写下了赞美杭州和西湖的不朽诗篇，如其中一首曰《钱塘湖春行》：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荫里白沙堤。

白居易的诗为杭州赢得了更大的声誉。北宋时苏东坡被贬官到杭州任通判（太守的副手），体察了民情；后来他又第二次到杭州，任知州，并为杭州百姓做了三件好事。同白居易一样，他写的关于杭州与西湖的诗篇也是千古绝句，使杭州和西湖名扬四海，其《饮湖上初晴后雨》曰：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但是，这时的杭州虽然繁华，北方的广大土地已成为金国的领土了。1127年，北宋王朝灭亡。1129年，南宋王朝建立，升杭州为临安府，1138年，定临安为行都。这时，北方的文人、富商、官僚等南迁的很多，临安不仅成了政治中心，也是全国最大的文化中心。南宋灭亡后，杭州的地位下降，但仍然是文物荟萃的大都市。元末明初的大文学家施耐庵、罗贯中似乎都与杭州有一定关系，有的材料甚至说他们就是杭州人。瞿佑在这样的文化都市中成长，编出《新话》这样的作品，无疑是深得地利之便。

《余话》的作者李昌祺是江西人，而江西的地理、人事状况，在唐以前，已由唐代大诗人王勃作过简明介绍，他在《滕王阁序》中写道：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